

以法治之劍嚴懲「佔中」首惡 「反佔中」三大急務應抓緊

陳振東 博士



陳振東

長達兩個多月的「佔中」行動，終於在絕大多數香港以及內地民衆的嫌惡、反對聲中，以近百名核心人物的自首或被拘捕而黯然退場，等待他們的，是法律的制裁。反對派籌劃年餘，全力引爆，妄圖一舉衝破中央對港管治的「原子彈」，慘淡收場。然而，「佔中」這場香港近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大規模政治風潮，卻令本地社會出現深刻的政治裂痕；香港百業遍體鱗傷。如何善後，是中央、特區以至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必須面對的課題。兩個多月來，香港這個一向以經濟城市自豪的都會，深陷政治衝突之中，七百萬港人猶如經歷了一次全面的「政治體檢」，也讓外界以及香港自身，對這顆東方明珠的現況及今後路向，有一全新的評估。其中，最明確的一個結論，可說是「佔中」雖說退場，卻絕非終結。「反佔中」的長期戰略以及行動，必須有持續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打算。筆者認為，「反佔中」的長期部署，有三大急務尤其迫切，必須立即着手進行。

高舉法治之劍 嚴懲「佔中」首惡

一，高舉法治之劍，嚴懲「佔中」首惡分子。法治是香港得以繁榮穩定的基石，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佔中」行動之所以能在一向守法的香港社群中動員出這般多的學生以至社會人士公然挑戰法律，一大原因在於反對派中的核心成員，多為平日披着法律界專業人士外衣的道貌岸然之輩。他們處心積慮大肆散播「公民抗命」可以受到法官尊重而輕判甚至不判，違法自首便不算破壞法治等等奇談怪論，煽動人們抱持「法不責眾」之類逃避刑責的幻想，公然犯法。

因此，香港要重建法治，必然要令在「佔中」過程中觸犯法紀的所有人，受到法律的追究。其首惡分

子，更必須依法受到制裁，不能以政治原因將之赦免或不予追究。否則的話，香港的法治將受到二次傷害，不法分子更將有恃無恐，港無寧日。

因時趁勢 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

二，通過政改第二輪諮詢，在香港進行「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再啟蒙」，令香港人真正明白國家的憲制地位以及香港作為特區的從屬身份。回歸十七年來，國家尊重港人，多提「兩制」，少提「一國」。但形勢的發展，卻是極少數香港人在外部勢力推波助瀾之下，不斷消滅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國家觀念，進而發展到公然鼓吹以至推動「港獨」。

從香港學聯在本次「佔中」行動之初提出的四項實體要求：「公民提名」、特首辭職、撤回人大決定、「政改五步曲」重啟，可以清楚看到確有部分香港人

視國家、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如無物，根本沒有任何國家觀念。至於跑到英國要求「南京條約重新生效」，聲稱「香港要民族自決」，衝擊解放軍軍營者，更是全然不知人間何世！身處何國！

因此，通過政改討論，持續推動香港的「一國兩制」「再啟蒙」，令香港市民明白特區的權責何來，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權責所在，極有必要，切不可掉以輕心。

「佔中」令反對派失去道德光環

「佔中」行動在長達79天的反覆拉鋸中，充分地暴露了搞手們的狂妄和無能，同時也暴露了他們完全漠視市民利益的傲慢。那些自命激進的人，看不到市民生活艱難，嘲笑反對「佔路」影響民生的人政治冷感，是「港豬」。這種批評來得太輕蔑，卻也令一開始盡量從善良角度去看待這些所謂精英及議員的善良市民驚醒，令反對派失去了長期佔據的虛假的道德高地，失去了絕大多數的民意。

「佔中」讓過去不關心政治的香港市民進一步認清「一國兩制」的現實意義，也認清了什麼樣的民主進程與爭取方式才符合社會利益。這正是香港「一國兩制」「再啟蒙」的最佳基礎。

特區須大膽推行經濟民生政策

三，特區政府必須大膽排除政治干擾，在經濟民生問題上更加專注，更有作為。無可否認，香港經濟發展近年與鄰近地區相比明顯落後，房價持續上漲，經濟狀況低迷，社會分化不斷擴大，青年人就業困難，向上流動性固化……在在都反映出香港內在發展動力已不如前，更遑論反對派逢政府必反，議會內無休止

地拉布阻礙重大經濟民生議題。

因此，特區政府經歷「佔中」一役，理應趁民氣可用，反對派主腦靜待審判之際，大膽推動各項重大的經濟民生工程。其中，一方面要有全局意識，積極爭取國家十三五規劃內列入更多支持香港傳統及新興優勢行業的政策及措施；另一方面，則要更主動地實施積極的財務政策，善用龐大儲備去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及眼前紓困作出貢獻。

目前已知政府將在未來三個財政年度，應可做到「年年有餘」。因此，政府首先必須面對因違法「佔領」行動而逐漸浮現的負面影響，考慮推行一些寬免措施以幫助紓困。

更好地幫助青少年成就理想

長遠而言，住房問題是香港最大政治經濟難題，政府為公營房屋支出提早儲備，設立「房屋儲備金」，無疑是應有之義。但與此同時，必須考慮一些更及時的應急措施，加快尋地、徵地以啟動建築，盡量縮短市民購樓換樓的燃眉之急。新界東北的發展不能再因少數人的反對而久拖不決，應在全港利益的基礎上，果決行動。此外，當前香港面對的各種社會矛盾，包括隔代貧窮、中產萎縮、老人貧窮、公立醫院資源不足等，都需要政府設立各種長遠基金，推出長遠政策以進行結構性的解決。

最後，應把資源更多用於幫助中小企業重塑營商環境和增強信心，包括積極牽頭推動香港各界特別是工商界更積極地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為香港學生求學以及青年就業、創業拓寬空間，成就他們的理想和希望。

從澳新看香港的高度自治(二)

蕭平

最近到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重點了解這兩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關係。雖說走馬觀花，管中窺豹，卻也頗有感悟。聯想香港的「一國兩制」，發現中央政府真的很放權，香港因為實行高度自治而享有的權利，不僅超過單一制下新西蘭的地方各市，甚至超過聯邦制下澳大利亞的各個州。

新西蘭1974年由國會制定《地方政府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強中央弱地方的態勢躍然紙上。外交、國防、教育、衛生等，中央均大權在握，地方政府重在市政建設及服務。澳大利亞雖然由6個州自下而上讓渡權力造就了聯邦，並以憲法約束聯邦權力，剩餘權力均屬州權。但隨著時間推移，聯邦的權力逐步擴大，而今已完成邦強州弱的翻轉。

深究起來，澳新強化中央權力，無外乎司法和稅收兩大手段。

先說司法。這一點澳大利亞更典型。當聯邦與州因為「越權」對簿公堂時，負責憲法解釋的最高法院往往支持聯邦。1920年的「工程師案」是壓縮州權的開始，以後趨勢漸成。1980年的塔斯馬尼亞州大壩案值得一提。大壩所在的富蘭克林河是塔州內河，且建壩工程已經啟動，聯邦政府宣佈終止，遂被塔州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以該河為世界自然遺產，而澳大利亞是自然遺產保護國際公約的締約國為由，判聯邦勝訴。該案確立了一個新規則，此後凡涉及澳大利亞履行國際公法和公約的事務，各州必須服從聯邦。此例一開，影響深遠。

聯邦權力不斷擴大，意味著州權被不斷蠶食，這與建國時聯邦權力過小，已不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競爭有關。在這一過程中，司法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明日再說稅收。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英各界籲議員勿干預港事免「自取其辱」

資深評論員 黃海振

西方走廊

英國下議院議員近期高調聲稱：北京拒絕英議員到香港「調查」《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是「公然對抗」，要求唐寧街緊急召見中國駐英大使，強硬對付北京。首相卡梅倫經不起彭定康等政客鼓動也稱北京「錯誤」，一時鬧得劍拔弩張、滿城風雨。隨着香港非法「佔中」被清場，倫敦的「強烈不滿」雖然安靜了許多，但仍有議員蠢蠢欲動，邀請「佔中」者往倫敦「作證」。據英國媒體披露，包括英國媒體、商界、學者等紛紛呼籲倫敦議員，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地，議員應以兩國關係大局為重，不要執迷不悟、「自取其辱」。

英國《衛報》認為，首相府稱「中國拒絕英國議會代表團訪問香港是『一個錯誤』」，此舉只會引發國際社會對英國過時的「殖民地思維」鄙視和反感。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說，議員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立場，以捍衛《中英聯合聲明》，實在是不智之舉；唐寧街應該注意的是北京「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或者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如果英方某些人還想繼續糾纏下去，這不僅是無理的，也是無用的，到頭來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表態；北京立場強硬，議員跳不出「殖民地思維」圈子，只會「自取其辱」。

不能想拿大單又「唱反調」

英國商界領袖認為，中國今後5年新增加對外投資將達5,000億美元，進口超過10萬億美元，中國赴海外遊客將達4億人次，英國應想辦法從中受益。《貝爾法斯特電訊報》發文稱，英國希望能與中國有更多商業合作，卡梅倫也一直強調中英貿易關係的重要性，並承諾到2015年把中英兩國貿易額翻一番，達到620億英鎊。空中客車公司威廉姆斯、捷豹路虎公司、勞斯萊斯公司的霍根等都認為，英國不能既想拿中國的大單，又和中國「唱反調」，讓卡梅倫的貿易願望化作泡影。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曾在香港《南華早報》與《明報》發表署名文章說，英國在香港普選問題上「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很多英國學者批評這一言論指出，英國在香港「佔中」期間，高調赴港調查是「非常愚蠢、缺少依據」；聯合國憲章列明各國主權平等，「一個國家並不擁有調查另一個國家的權力」。與此同時，中國駐英大使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認為英國議會的所謂「調查」是干涉中國內政，結果只會助長「佔中」違法分子的氣焰，有害而無一利。

勿「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近期英國議會邀請香港反對派舉行視像會議，就《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的落實情況作證；請曾在「佔領」行動期間被捕的社運副主席吳文遠赴英表達意見；既是可笑，也是徒勞。如果英國議員蠢到想響應香港極端少數學生「希望英國繼續跟進和執行《南京條約》」，除毫無任何意義和結果外，將繼續「自取其辱」。英國下議院議員如果繼續指責北京的反應是「公然對抗」；繼續用100年前的傲慢方式和北京講話；繼續輕視中國人的民族尊嚴，他們得到的最後結果則一定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重視國情教育 培養青少年國家認同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出席回歸15周年慶典期間，強調要加強青年教育培養，國情教育要放在突出位置，牢牢把握與祖國命運相連。

習主席的講話同樣適用於香港。本港青少年學生之所以成為違法「佔中」先鋒和主力軍，歸根究底在於本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光輝歷程缺乏認識，導致國家民族觀念薄弱，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汲取教訓，未來國情教育要放在突出位置。

在違法「佔中」期間，青年學生成為了主力。香港回歸已經17年，但從特區教育體系中培養出來的一些青年學生卻站在了特區政府和國家的對立面，這令人深思。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12月17日再度舉行聽證會，「了解」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多名反對派政客配合「作證」，香港社會各界皆批評他們喪失國格。最令人驚訝的是，配合「作證」的一名香港大學學生及一名中文大學學生聲稱，中央政府多次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包括「剝奪」內文訂明港人能繼續享有的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及普選權利，英國應該迫使中國「履行」聯合聲明並作出譴責，甚至重啟《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云云。

一些青年學生站在國家對立面令人深思

對於折騰香港79天的「佔中」，社會各界已指出這反映本港歷史教育的缺失，反映時下年輕人缺乏對國家的感情與身份認同感，他們未能站在歷史的角度去思考香港問題。上述兩名香港大學學生竟然聲稱要重啟《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典型地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清政府與英國簽署《中英南京條約》，這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趁火打劫，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包括《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是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與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在天津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為標誌，中國一步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

孫中山先生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視，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當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許多志士仁人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英勇犧牲，表現了崇高的愛國精神。陳天華跳海而死，在《絕命詞》中諄諄以「丕與國家」囑告同志，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喚醒人們，「皆以愛國為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吳越在行刺出洋五大臣之前，寫給妻子的訣別信中，要求她不斷提高「愛國之精神」；林覺民、方聲洞在黃花崗起義前，給妻子父母的絕筆書中，也豪邁而深情地告訴親人，他們之樂於捨生赴義，是因為「祖國存亡在此一舉」，是「為天下人謀永福」。對於他們來說，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惜為之捐軀獻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來侵略首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不僅徹底挫敗了日本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企圖，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的屈辱歷史。中國人民為了民族解放、人類正義、和平付出了巨大犧牲，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財產損失6000多億美元，戰爭消耗400多億美元，無形財產不計其數。

把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突出位置

習主席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

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途，加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段話完全適用於香港。

香港青年的「一國兩制」再啟蒙，要重視培養香港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學習中國歷史是不二法門。劉遵義教授曾經在報章撰文表示，他在2004年回到香港後，很驚訝地發現中國歷史已經不再是中小學必修科目，而在英國、美國、日本，以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國民歷史都是必修科目，香港特區不應例外。

2000年取消了回歸前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到2009年課程改革大幅削減選修科目後，中史科竟然無人問津，導致新一代因不知歷史而對國家產生誤解甚至抗拒。更嚴重的是，這使反對派各種「去中國化」的謬論和行動在青年人中有了市場，從2012年以來的「反國教」、「反新界東北規劃」、「反割地賣港」、「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驅蝗運動」、「反強國人」，再到「佔中」期間的「反人大決定」、「香港民族、命運自主」、「全民制憲」，這些排斥國家民族的行動和謬論，竟然在青年學生中謬傳流傳，更加說明要加強青年教育培養，國情教育要放在突出位置，要培養本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認同，牢牢把握與祖國命運相連。

習主席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



楊志強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至理名言。

今日的年輕人大聲宣告：未來是屬於他們的。的確，未來是屬於今日的年輕人，但是，數十年後，今日的年輕人掌權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再是年輕人，思想仍然和今日一樣嗎？

是的，今日的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似乎比三十年前的年輕人差了，這是人口老化的結果。三十年前，五十五歲退休，四十歲肯定是中年人，三十歲已不算年輕。再往前推，一百年前，七十歲是古來稀，五十歲是老頭子，人們有機會在年紀輕輕時就能夠出人頭地。

但人口老化的結果是六十歲的人不肯退休。看看今日香港政壇上活躍、掌權的人，

青年向上流問題的時代背景

曾淵滄 博士

多少低於六十歲？五十歲被視為少壯派，民主黨內多次的黨爭就是由一群早已年過五旬，但是仍被視為少壯派的人發難的。五十歲的一輩是少壯派，二十歲的人哪來出人頭地的機會也？因此，今日的年輕人知道加入一個傳統的政黨，然後在黨內排隊，論資排輩等出人頭地是異常困難的，唯一的出頭機會就是自己另起爐灶，自己站在最前線打出一條路，這就是為甚麼香港會出現社運、人民力量、熱血公民、學民思潮的原因。

年輕人站在反建制、反政府的立場，其實是因為另起爐灶可免去在傳統反對派內排隊上位的痛苦，因此吸引大批年輕人加入，反觀建制派陣營中，年輕人想出頭，還得耐心排隊等待，這值得引起我們深思。